

简论伊斯兰文化对蒙元工艺美术的影响^{*}

董波

(苏州大学艺术学院,江苏苏州 215021)

摘要:蒙元时,亚欧大陆文化交流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中西交流频繁。当时,伊斯兰文明已成熟,向外辐射着文化要素,中国工艺美术深受其影响。以此为研究对象,力图揭示一段文明史。

关键词:蒙元;伊斯兰;文化;工艺美术

中图分类号:J509 **文献标识码:**A

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后,随即大规模扩张。此后几十年,蒙古铁骑横扫亚欧大陆,从东亚到西亚,中国和伊斯兰文明迎来了蒙古统治者。相对于文明发达地区而言,扩张前的蒙古生产力水平并不高,因此,蒙古人非常重视贸易,也看重手工业。他们建立统治后,中国和伊斯兰世界各地的贸易和手工业受到保护,获得较大发展。由于伊斯兰居民也有游牧传统,生活方式和思维习惯与蒙古人有不少相通之处,所以伊斯兰商人和工匠尤受蒙古人器重。当时,蒙古大汗领地在中国,吸纳了大批伊斯兰商人和工匠,这使蒙元时期的工艺美术颇受影响。这种影响既表现在产品的视觉形式上,也表现在制造技术上,在创造时尚的同时,启引着中国后世工艺美术的发展。

1 蒙古统治者对伊斯兰产品的钟爱

早在立国时,蒙古贵族即已表现出对伊斯兰产品的钟爱。1218年,成吉思汗向中亚伊斯兰王国花刺子模派出了数百人的友好商团,意图获得更多奇珍异宝,而花刺子模国王摩诃末却命人处死其成员。贸易不成,便成掠夺,成吉思汗全面西征随即发轫。到了窝阔台统治时期(1229—1241年),由于蒙古国政局稳定,丝路畅通,更多的伊斯兰产品进贡到蒙古宫廷。南宋使者出使蒙古时,看到有效仿“回回”样式的环刀和“回回国”所贡的瓶装葡萄酒。又据古伊朗史家记载,窝阔台曾命人将伊斯兰珠宝和织金衣料等物与契丹(中国)物品并置,以明示伊斯兰产品的高档性。元朝建立后,大汗身边充斥着来自伊斯兰世界进贡的宝物。最多的是名贵的宝石,称“回回石头”,还有一些毛织精品,如作为“回回毛布之精者”的“速夫”。即便到了元后期,蒙古贵族对伊斯兰产品的热情依然未减。1353年,元顺帝笑纳了金帐汗国(Qibcaq ulus)的献宝,其中,“米西尔刀”被认为是来自伊斯兰麻木鲁克(Mamluk)王朝。在顺帝宫廷,亦铺有来自属宾的毛织物,其嫔妃则穿着于阗花蕊草织成的衣物。属宾和于阗当时都已伊斯兰化。

蒙古人对伊斯兰产品的热衷,有其文化的原因。伊斯兰文化最大的特点是简单明晰,一定程度上比汉文化更易于亲近蒙古人。穆斯林亦有经商传统,伊斯兰特产很容易进入蒙古人的生活圈。加之伊斯兰产品繁缛华丽,毫不晦涩,较适合游牧生活,自然会受蒙古贵族的青睐。当蒙古人成为中国的统治者时,其消费需求(涵盖生活品位和审美情趣)便会有较强的渗透性。就连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文人也受到影响,他们中的一些人对伊斯兰工艺造物亦有赞美之辞。对于工艺美术来讲,满足消费需求乃是根本,由此,伊斯兰文化的影响才会十分突出。

2 中西国际贸易的作用

蒙古人是草原牧民,生产形式较为单一,因此主要通过贸易来丰富物质生活。成吉思汗扩张的首要目的即是要控制中西国际贸易通道。到窝阔台汗时,征服亚欧腹地大片地区的蒙古国设立了驿站,中西商路极为畅通。尔后,中亚贸易通道虽有短暂不畅,但蒙古贵族一直实行重商政策,况且,海上贸易一直较为兴盛。

对于中国古代工艺造物来讲,国际贸易起着重要作用。众所周知,古代中国人以工巧著称,丝绸、瓷器等物品的制造一度

* 收稿日期:2007-05-18

作者简介:董波(1975-),男,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和艺术史。

基金项目: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SK105701)。

令外国人望尘莫及。但有一点不容忽视,中国虽地大物博,但并非无所不有,一些造物所需之资则须进口。同时,中国产品常令外国人爱不释手,国外市场潜力也很大。所以,外国人提供的原料和购买力都可以成为中国手工艺的延伸。而这点正是促进中国工艺传统变革最重要的因素。

在蒙元时期,中国手工艺传统就因国际贸易的蓬勃发展而迎来变革。元代宫廷地毯染红所用之染料有回回茜根,它产自亚美尼亚,经撒马尔罕转运而来。亚美尼亚人信仰基督一性论(Monophysitism),但与穆斯林关系极为密切,而撒马尔罕则是中亚伊斯兰重镇。元代靛蓝也有来自伊斯兰世界的。元代龙泉窑瓷釉色转绿,尚刚推测与伊斯兰教什叶派文化影响有关。毕竟,当控制波斯的蒙古伊尔汗国(Il-qan ulus)以什叶派立国时,元朝与其海上交往颇多,而龙泉窑正是从海路大量外销。当然,最值一提的是元青花的兴起,它与国际贸易的关系最为紧密,对中国工艺传统的变革作用也最大。

所谓青花,即是以钴呈色的陶瓷器。钴对窑温和窑内气氛都不敏感,只要釉彩中钴的分量足以呈色,鲜艳的深蓝色釉彩便会呈现。可见,青花工艺的首要因素不在烧制工序,而在钴料本身。元青花以景德镇青花为贵,色彩艳丽,其钴料即是从伊朗进口的。景德镇青花全面兴起大约在1320年以后。当时,蒙古西域诸汗国都以伊斯兰教为国教,它们与元朝的关系也趋于稳定,贡赐和贸易频繁,元廷完全可能获得伊斯兰钴料。12、13世纪,用当地钴料呈色的青花釉陶即已在西亚有较大发展,其技术无疑对元青花有启示作用。不过,伊斯兰青花陶的品质难以与后来居上的元青花(一次烧成的釉下彩瓷器)相比,因此后者在伊斯兰世界颇有市场。据元代旅行家汪大渊记载,中国青花瓷不少销往伊斯兰世界;中亚、南亚、西亚和非洲等地都有元青花出土。西亚等地的伊斯兰权贵尤好收藏元青花,今有其藏品数十件,见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托卜卡皮·萨拉伊(Topkapi Sarayi)博物馆和伊朗德黑兰考古博物馆。

从国外藏品看,当时外销的元青花不少拥有十足的伊斯兰风。在伊斯兰世界,人们饮食习惯于围坐在大型敞口容器旁,伊斯兰大盘、大碗十分常见,外销的元青花也屡见此类器皿。穆斯林习惯游牧生活,外销的元青花也见不少适合携带的扁壶。牛津大学阿什摩尔林(Ashmolean)博物馆藏的一件元青花高足杯和剑桥威廉·费提兹(William Fettes)博物馆藏的一件元青花盘座器,器形皆仿自伊斯兰器物。外销元青花装饰的伊斯兰风格更加明显,其普遍满饰,繁复的横向带状和同心圆装饰与伊斯兰器物装饰形式一致;阿拉伯式纹样(Arabesque)也被引入了,这是一种以复杂而又规则的连续曲线为主干,间以植物花叶构成的抽象纹样,流行于伊斯兰世界。

对元青花来讲,伊斯兰的影响是广泛的,不限于外销品。河北省博物馆藏有青花釉里红盖罐(附图),其底部的变形莲瓣纹被认为是伊斯兰同类纹样影响的结果;其腹部的开光亦与伊斯兰文化有染,而围出开光的缀珠纹多见于此前伊斯兰金属器上;另外,其肩部云肩纹可能源自一种流行的伊斯兰忍冬纹,后者至少在11世纪即已出现在埃及陶器上。此器物为河北保定窖藏出土,难以认定是外销品。不过,国外也有类似品种收藏。其纹样有如此众多的伊斯兰要素,说明伊斯兰文化的渗透是很强的,而外销亦是必须考虑的因素。



附图 青花釉里红盖罐

3 伊斯兰移民的效应

蒙元时期,中西间不仅物资交流频繁,也存在广泛的人员流动。最值得一提的是是迁居中国的穆斯林,其数量巨大,种族众多,职业庞杂,必然激起文化的波澜。他们在元代作为“色目人”,地位仅次于蒙古人,高于汉人,具有相当大的社会影响力。

从出土物看,元青花有不少为国内穆斯林或伊斯兰文明的钦慕者持有,他们属社会上层。江苏金坛出土的元青花云龙纹罐窖藏中,有件银盘,上刻阿拉伯文回历年,估计窖藏主人与伊斯兰教有染。在云南禄丰,亦出土不少青花罐,呈色用本地钴料,质量虽不及景德镇青花,纹饰却有一致。元代云南是穆斯林重要的屯聚区,来自中亚的穆斯林赛典赤·詹思丁及子孙曾长期治理该地,禄丰元青花应与中国本土伊斯兰文化的发展有关。

元代金属器出现了一些新气象,也与穆斯林移民的大量到来相关。尚刚指出,石家庄史天泽家祖墓和临澧窖藏出土一对龙首金手镯和四对龙首银手镯,以及临澧窖藏出土的元代金银杯上都有伊斯兰要素。他还说:“在元代日用铜器中,有些大盘制作精彩,其形制之大、做工之精、图案之繁都很有时代特色。铜盘图案的组织 and 题材均与元青花相似,几乎每一种形式都能在元青花上找到同类”。由于元青花造型和纹样与伊斯兰器物有染,似可说明元铜盘和伊斯兰文化的联系。

尤须指出,在蒙元时期的伊斯兰移民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工匠。蒙古西征,每每屠城,却不杀伊斯兰工匠。这些人随蒙古军大量来华,他们及子孙后来多服务于元代官方作坊。这样,原汁原味的伊斯兰手工艺技术,便移植到了中国。

首先能体现这点的是元代纺织品。对于游牧民族来说,纺织品对塑造环境和生活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华丽的伊斯兰织品对蒙古人有着极强的吸引力。尤其是伊斯兰织金,蒙古贵族更是爱不释手。元代伊斯兰织金锦称“纳失石”,官方作坊中

至少有5个机构主要负责组织西域工匠织造它,更有兼造的。“纳失石”为宫廷专属,用量很大,无论工艺技术还是艺术形式,都有浓郁的伊斯兰风格。

元廷还有一个机构专门组织西域工匠织造“撒答刺欺”。这种织物得名于布哈拉(Bukhara)以北的Zandana,是中亚河中(Transoxiana)传统织锦。7世纪末至9世纪,撒答刺欺已渗透至中国西北。蒙古兴起时,河中已伊斯兰化,撒答刺欺必显伊斯兰风格。尚刚指出,蒙古国时,已有一个由不花刺(布哈拉)工匠组成的局院,大约也织造撒答刺欺。今天虽难以实物确指撒答刺欺,但蒙元墓葬出土的织锦还是展示了其风貌。元政府在匠作院下专设一些部门,负责采集各种外来图式,尤其是伊斯兰纹饰。

元代官营作坊还网罗了西域毛织工匠,大都毡局、上都毡局皆有西域工匠。《大元毡罽工物记》载有“回回剪绒毡”,应与伊斯兰手工艺有染;另有官匠以狗毛和兔毛织造“如西锦”的产品献给大汗,获得了升迁。

蒙古人靠武力征服天下,看重兵器,而在冷兵器时代,优质的铁尤受器重。在西域,有一种优质铁,中国人称其为镔铁,在叙利亚、波斯等地最有传统,早在唐代即已入华。辽人已拥有较多镔铁武器。到元代,官府设镔铁局,用西域工匠,产品多为怯薛侍卫所配之刀剑,亦有作贵族日用品,如用以割肉的小刀。这种工艺应与伊斯兰工艺相关。

元代的硅酸盐工艺也可能有伊斯兰工匠的参与。前面说到的青花即是一例。另据记载,元代宫殿的琉璃,“与天一色”。这种釉彩应主要不是钴呈色,因为钴彩呈深蓝,而非天蓝,且元代上品钴料依靠进口,十分精贵,难以大规模地用于屋顶琉璃,而孔雀绿釉才是最合理的解释,它色彩近乎天蓝,为铜呈色中温碱釉。在元大都遗址,的确出土了这种釉瓦。在中国以西,中温碱釉传统悠久,蒙古征服前,伊斯兰孔雀绿釉已十分发达。而在中国,至少唐以前,此种釉彩没有传统,秦大树指出,13世纪以来,它才大兴于中国。有学者发现,元代浮梁磁局烧造的孔雀绿釉器模仿波斯陶器的痕迹十分明显,看来它的确受到了伊斯兰文化的影响。

西域悠久的中温碱釉传统,基于其发达的碱金属助熔玻璃工艺。东地中海地区富含纯碱矿(Na_2CO_3),人们用其助熔玻璃,而在伊朗和中亚,相对后起的玻璃工艺则用钾助熔。在中国,直到宋代,土产玻璃仍主要是铅玻璃,似无使用碱金属玻璃的传统。1982年,淄博博山大街发现了一个玻璃作坊遗址,年代约13—14世纪,出土玻璃不见铅玻,为钾玻璃,与伊朗和中亚的产品一致,而且不少品种色彩似孔雀绿釉。考虑到当时中西交流之盛,以及中国中温碱釉的西域因素,这很可能受到了伊斯兰的影响。

与釉彩和玻璃都相关的是珐琅工艺,后者因加入硼砂,呈乳浊状。元以前,珐琅在中国缺乏清晰连贯的线索。而在东地中海地区,珐琅深厚的传统却有目共睹(与中温碱釉一样)。蒙古人兴起前,伊斯兰金属胎掐丝珐琅已成熟。明人所载之“大食窑”即指这种工艺,而“大食”一度是中国史书对伊斯兰国家的称呼。钱伯泉推测,元代移居云南的穆斯林可能带来了掐丝珐琅技术。虽有争议,杨伯达已鉴定出几件元代金属胎掐丝珐琅器。

4 结语

伊斯兰文化对蒙元工艺美术的影响是较为深入广泛的,与当时中西交流状况,统治阶层的喜好及社会风尚最为相关。古代中国工艺传统之所以能长盛不衰,正因为它可以利用历史契机,通过吸收外来要素而更新自身,元代工艺美术便是透视这一点的绝佳窗口。

参考文献

- [1] 宋濂.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5.
- [2] 彭大雅,徐霆.黑鞑事略.丛书集成初编本[C].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
- [3]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元明史料笔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 [4]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 [5] 尚刚.元代工艺美术史[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
- [6] 沈福伟.中国文化通志·中国与西亚非洲文化交流志[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 [7] 黄时鉴.东西交流史论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 [8] 马文宽.中国青花瓷与伊斯兰青花陶[J].中国历史文物,2003(1).
- [9] 马建春.元代东迁西域人及其文化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 [10] 秦大树.试论翠蓝釉瓷器的产生发展与传播[J].文物季刊,1999(3).
- [11] 陈克伦.略论元代青花瓷器中的伊斯兰文化因素[J].上海博物馆集刊,1992(6).
- [12] 钱伯泉.大食窑与景泰蓝[J].阿拉伯世界,1992(4).
- [13] 淄博市博物馆.淄博元末明初玻璃作坊遗址[J].考古,1982(6).

简论伊斯兰文化对蒙元工艺美术的影响

作者: [董波](#)
 作者单位: [苏州大学艺术学院, 江苏, 苏州, 215021](#)
 刊名: [苏州大学学报\(工科版\)](#)
 英文刊名: [JOURNAL OF SUZHOU UNIVERSITY \(ENGINEERING SCIENCE EDITION\)](#)
 年, 卷(期): 2007, 27(5)
 引用次数: 0次

参考文献(13条)

1. 宋濂 [元史](#) 2005
2. 彭大雅, 徐霆 [黑鞑事略. 丛书集成初编本](#) 1936
3. 陶宗仪 [南村缀耕录—元明史料笔记](#) 1959
4. 志费尼 [世界征服者史](#) 2004
5. 尚刚 [元代工艺美术史](#) 1999
6. 沈福伟 [中国文化通志*中国与西亚非洲文化交流志](#) 1998
7. 黄时鉴 [东西交流史论稿](#) 1998
8. 马文宽 [中国青花瓷与伊斯兰青花陶\[期刊论文\]-中国历史文物](#) 2003(1)
9. 马建春 [元代东迁西域人及其文化研究](#) 2003
10. 秦大树 [试论翠蓝釉瓷器的产生发展与传播](#) 1999(3)
11. 陈克伦 [略论元代青花瓷器中的伊斯兰文化因素](#) 1992(6)
12. 钱伯泉 [大食窑与景泰蓝](#) 1992(4)
13. [淄博市博物馆 淄博元末明初玻璃作坊遗址](#) 1982(6)

相似文献(10条)

1. 期刊论文 [哈宝玉 蒙元时期的穆斯林与伊斯兰教法—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4\)](#)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民族大融合时期,生活在多元文化社会背景下的穆斯林如何调适与社会、国君之间的关系,这是其生存、发展的首要问题,本文以伊斯兰教法为切入点,探讨蒙元时期穆斯林与主流社会的良性互动和伊斯兰教法与国法(国君)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2. 期刊论文 [丁光泮.DING Guang-pan 再论蒙元时期基督教在华传播—涪陵师范学院学报2005, 21\(1\)](#)
 基督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信仰人数众多,流传广泛,历史悠久,但蒙元时期在华传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规模并非巨大,从整体上讲,它在中国的影响,要远小于伊斯兰教。
3. 期刊论文 [张海波.Zhang Haibo 对“泉州伊斯兰历史文化”陈列馆捐赠品考释—海交史研究2001\(2\)](#)
 据《中国文物报》7月18日:泉州将投建“泉州伊斯兰历史文化”陈列馆报道。笔者多年来收藏有一部分蒙古草原发现的蒙元时期伊斯兰文化的收藏品。为弘扬草原丝绸之路为中西方文化艺术、宗教的传播交流起到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将把这些收藏品捐赠给将成立的“泉州伊斯兰历史文化”陈列馆。现对此收藏品做一简要说明分析。
4. 学位论文 [刘艳霞 伊斯兰教在蒙元时代的中国化](#) 2006
 中国伊斯兰教将伊斯兰教的基本原理与儒家伦理思想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使其既符合儒家伦理的传统,又不违背伊斯兰教的基本原则,构建了独特的中国伊斯兰教伦理思想体系。早在蒙元时期,这种结合已悄悄开始。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论述了这一特定期,伊斯兰教的中国化,并有所创新。 整篇文章分为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绪论,主要阐述了选题原因和研究现状。 第二部分:正文,分为六节:第一节,简单介绍了伊斯兰教中国化的背景;第二节,论述了蒙元时期伊斯兰教开始中国化的可能性与必然性;第三、四节,分别从伊斯兰教的附儒、穆斯林的中国化、伊斯兰教宗教组织的逐步完善及宗教建筑的中阿合璧来论述伊斯兰教在这一时期中国化的表现;第五节,总结了这一时期伊斯兰教中国化的特点;第六节,阐述了蒙元时期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影响与作用。 第三部分:结束语,是本人写作本文时,在借鉴他人之见的基础上所得的观点。
5. 期刊论文 [马娟 试论伊斯兰教在蒙元时期的传播及其特点—青海社会科学2003\(1\)](#)
 公元1219年,成吉思汗发动举世震惊的第一次西征,1235年拔都进行第二次西征,1252年旭烈兀进行第三次西征。这三次西征在世界史上产生了深远而又重大的影响,甚至改写了许多国家、民族的历史。随着西征之中被签发的穆斯林军士、工匠、归附者、……
6. 期刊论文 [刘迎胜 社会底层的汉—伊斯兰文明对话—对回族语言演进史的简要回顾—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4, 41\(1\)](#)
 自伊斯兰文明进入中国之时起,就开始了最初的汉—伊斯兰文明对话。蒙元时代入华回回人是回族的主源。在13—14世纪的中国,波斯语是旧大陆的主要国际交际语(lingua franca)之一和元代的主要外交语言,是回回人的共同语和新母语,是元代三种官方语言之一。元代回回人在人种相貌体质上与汉人有较大区别,但后裔逐渐放弃自己的母语,改用汉语汉文。在母语转换的过程中,回回人经历了一个双语时期。当代部分回族与西北的东乡族、保安族与撒拉族人民中还流行着一种用阿拉伯文与波斯文字母为基础拼写的文字,即始创于明代中期以后的“小经”文字。创制“小经”文字的人可能是生活于社会底层的回回百姓。

7. 期刊论文 马建军,海梅 蒙元时期六盘山区的蒙古人 -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08, 29(2)

蒙元时期,六盘山区是一个特殊的地区,因蒙元政权早期三位最高统治者即成吉思汗、蒙哥、忽必烈都以这里为大本营,进行过大规模的军事活动,加之开城安西王府的设立和屯田的广泛开展及镇戍军的驻扎,这个区域迁徙居住有大量的蒙古人 and 中亚各部族,诸如回回、畏兀儿、钦察、康里、阿速、哈刺鲁、唐兀、阿儿浑等,这里遂成为诸多民族迁徙、定居的重地,导致了民族间的交流、融合与发展,伊斯兰教的快速传播,促使蒙古人与各族人民相互融合,形成了新的民族共同体——回族。

8. 期刊论文 左芙蓉, ZUO Fu-rong 罗马天主教与蒙元的关系 -内蒙古社会科学2007, 28(3)

13世纪初,罗马天主教就开始与蒙古接触,罗马教皇曾派方济各会会士面见蒙古大汗,劝其停止征战;率领十字军东征的法王路易九世也曾让另一位方济各会会士前往蒙古军队送信,以联合对付伊斯兰教国家,但都未成功。蒙古入主中原并建立元朝以后,却又主动要求罗马教皇派遣天主教士来华,于是天主教正式传入中国并且得到传播和发展,这一变化的出现有着复杂的原因,值得深入探究。

9. 期刊论文 佟洵, TONG Xun 佛教在元大都传布的历史考察 -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9, 7(3)

元朝是由蒙古贵族建立的幅员辽阔而统一的多民族大帝国,蒙元统治者在宗教信仰上实行“兼容并包”和承认现状的政策,对中原地区已有的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以及其他宗教信仰都予以承认,故在元朝形成了多种宗教与文化并存、共同发展的局面。由于蒙、藏的特殊关系,元朝统治者对藏传佛教尤为尊崇,并且将藏传佛教的“领袖由国师提为帝师,建立起元代特有的帝师制度,使藏传佛教及其领袖具有了崇高的社会地位”[1]696。由于元朝统治者对佛教特殊的关爱,作为蒙元帝国的大都(即北京地区),无论是汉传佛教,还是藏传佛教在元朝统治时期都颇为兴盛。元朝政府在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改总制院为宣政院,进一步加强了对全国佛教的管理,元大都遂成为佛教发展的中心。

10. 期刊论文 丁明俊,马芳 元代回回人与中西文化交流 -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4)

蒙古人西征曾给阿拉伯及中亚伊斯兰文明带来灾难性毁灭,同时打开了中西文化交流的通道,蒙元时期大量穆斯林入华,带来了阿拉伯伊斯兰地区先进的科技文化,包括天文历算、医学、数学、几何学、地理学、化学等方面科学技术,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文化宝库,同时中国先进的管理经验、火药武器、印刷术也传入阿拉伯地区,其中回回人在元代中西文化交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本文链接: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szscgxyxb200705002.aspx

下载时间: 2010年3月23日